

文学创作

经典秩序中的“70后”作家

□李敬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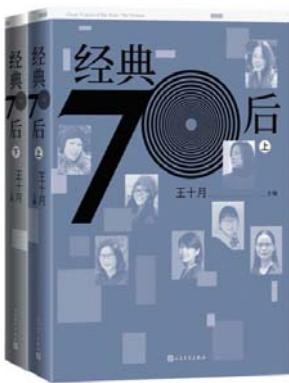
人们以青春的名义、以后来者(先进者)的位置确立某种身份,但时间和历史终会将人回收到它的浩大苍茫中去。“经典70后”,这本身就是一个回收行动。《经典70后》这部书的编者显然认为,对于这些作家,我们不应该仅在一个未来的、未完成的视野里看待他们,现在开始,掉转目光,应该把他们纳入某种经典秩序里,把他们视为某种连续、延展的图景构成部分,由此,他们被历史化,他们可以被写进文学史啦。

于是,编者把这十六位作家放在一起,实行了一次“再集体化”。虽然他们确实都生于上世纪70年代,但这十六个人大多并不属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那一批“70后”,代际的指认和认同其实并非他们各自写作生涯中的重要因素。把他们集合起来,想必不是为了回到当年的问题上去,而是“再问题化”,建立某种视野,使这些作家集体显影。

很可能,这部书的编者注意到这一代作家与中国过去四十多年巨大变革的特殊关联。当然,我们所有人都是巨变的在场者,但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人们有所不同,他们是巨变所直接塑造的第一代人,这使他们在在一个特殊位置上感知历史和现实。

由此派生出一个经典化过程中的特殊问题,那就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新时期文学,特别是85后的文学所塑造。50后或60后那批迅速经典化的作家构成的巨大压力,在以往的文学史上鲜有先例,后者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前辈,而且是直接的、根本的立法者,几乎以先在的“唯一性”内化于他们对文学的信念。

这两个方面叠加,形成了一种视野,似乎是这一代作家一面共同立足



王十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主编
《经典70后》

于特殊的历史和现实位置,一面共同面对经典秩序压在眉睫的压力和引力。他们的“经典化”要以一种“集体作业”的方式被衡量和估定。

这种视野是有效和必要的。尽管每一个作家,当然包括70后作家都期待着作为个体得到指认,但是,当我们在历史化过程中辨认个体时,实际上不得不借助大于个体的认识装置,要点在于,这种装置足够错综精密,最终能够准确地将某个作家在一个时代的众多写作者中定位出来。

两卷《经典70后》,选取了十六位作家的十六篇作品,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这里还有对应的十六篇作家论。作家和批评家被召集于同一个场域,形成了比较、竞争。批评家描绘一个作家的形象,这种描绘在历史和文学史的景深中展开,与背景之间的离合与迎拒,使有的作家泯灭于背景,而有的作家从背景中凸显出来,成为意义独具的饱满的存在。在面对着历史、时代和文学传统,寻求和发现意义的过程中,批评家不仅将作家对象化了,同时也将自己对象化了。

所以,此两卷书深具理趣。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十六位作家,我们还在观察十六位批评家,在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对话中,我们有可能明晰地看到这一代人的文学如何获得自觉,这种自觉是在特定视野、特定问题场域中形成的,它庞杂充满矛盾,它包括对世界、对现实的不同理解,也包括对于文学如何再现、再造现实的不同选择方案。

但读罢雄文十六篇,我也感觉到某种不满足。“作家论”作为一种批评体式,旨在从整体上确立一个作家。作家论当然各有各的作法,但揆诸《经典70后》的立意,这种确立显然是要在历史和文学史的碰撞中为一个作家撬开一处空间,这新确认的空间也就是一个作家的意义所在。就作家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而言,他的任何表达注定是通过语言的、艺术的复杂中介实现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语言和艺术的表达自身就完整地呈现着

作家面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力和创造力。

然而,当我们谈论历史和现实、谈论一个时代的人类经验时,我们很容易只作循环论证的对照,我们无法说明在特定的艺术呈现中,现实和经验如何获得了形式,这种形式如何成为了某种总体性征候。当我们深入地、富于敏感和洞见地分析一个作家的艺术特点时,我们也可能常常把它当作了纯粹的个人风格,把它放在文学传统和既往文学经验的序列中作出评价,我们可能并未充分省察在一个特定时代、在此时此刻,风格或者艺术构造本身就是总体性的认识和表意装置。

如前所述,70后作家承受着上世纪80年代后期迅速而强固地建构起来的纯文学“新传统”的支配性压力,但几乎就在踏上写作之路的同时,他们正好赶上了大众文化的兴起,赶上了互联网带来的写作、发表与传播的革命。两间余一卒,提笔独彷徨,他们处境的紧要之处在于,他们面临着全新的文化逻辑和文学的一系列基本条件的变化,从他们开始,在社会视野中、在公众生活中,文学越来越不再是他们原来习得的文学。

这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常常不是从理念而是从经验开始,从我们实际上如何阅读开始,可能需要很久的时间才会修正我们的意识,成为明确的观念。但文学性的危机、在全新的条件下重新界定和塑造文学,这的确就是70后作家赤手空拳上得路来劈头遭逢的问题。

此时此刻,如果我们认为确有必要在一种经典秩序中确定这一代作家或其中某些人的空间和位置,那么,我们可能首先需要估量他或她是如何使这个秩序部分失效,如何涨破这个自足自律的秩序,也就是说,我们与其论证他们如何文学,不如论证他们如何“不文学”,如何重新在新的总体性条件下勘探和发明文学。

(节选自《经典70后》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休闲说话

闲读之妙

□王淼

古人读书,有“三余”和“三上”之说。三余,指的是时间,“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是最适合读书的时光。三上,指的是地点,“马上、枕上、厕上”,是最适合闲读的地方。所谓枕边书,就是放在床头随便翻阅的书,也是最适合“日之余”在“枕上”阅读的书。

枕边书最好是闲书,是不必正襟危坐随意翻阅的书。常常是在将睡未睡之时,随手拿起一本闲书,胡乱翻阅,不必从头,也不必读完,风吹哪页是哪页,读到哪里算哪里,看困了倒头就睡。有一段时间,我把金庸的武侠小说和劳伦斯·布洛克的侦探小说当成枕边书,书的确好看,读着也过瘾,只是一旦拿起就难以放下,太兴奋,容易失眠。后来我就只把那些有着迷人细节和片段,可以随时拿起、随时放下的书当作枕边书。

我在枕边消磨掉许多难忘的阅读时光,明清笔记小品——诸如《浮生六记》《板桥杂记》之类,以及国外的《昆虫记》《墓畔回忆录》等等,都是我最喜欢读的枕边书,都给我留下愉快的阅读记忆。我最近在读的枕边书是《蒋捷词校注》《冯梦龙民歌集三种》《明人的旅游生活》《明人的舟游生活》,这些书放在枕边,临睡时随便翻翻,虽然每晚只读一些片段,却深得闲读之妙。

我是美国侦探作家劳伦斯·布洛克的粉丝,从读到他的第一本书起,我就喜欢上他的文字,即便再忙,我也会抽出时间读一会儿他的小说,对我来说,这既是一种消遣,又是最好的休息。

布洛克笔下的马修是一个侦探,却更像是一个都市漫游者,探案只是他的副业,偶尔为之开开心,不过是生活的调剂品。他常常在酒吧里泡着,见识各种各样的人,然后约会,恋爱,闲逛,或者回自己的公寓,一个人呆着,胡思乱想,或者走神,度过懒散的时光。马修的主业其实是享受生活,好好占有每一天,生命如此短暂,时间如此珍贵,秉烛夜游犹嫌不够,哪有时间去浪费生命呢?

的确,日子是过给自己的,自己高兴就好,别人如何看待完全无足轻重。没有人是完美的,有缺点的人才可爱!作为一个侦探,马修的原则是他的良知,他的良知就是他内心的法。这种价值观只是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不否认,布洛克的小说有点模式化,但他的小说重点不在故事,故事总会被人慢慢遗忘,但马修这个人却不会——即便不读布洛克的小说,我依然会感受到马修的自由散漫,感受到他的爱恨情仇,感受到他从年富力强到渐渐苍老……这远比故事更美妙。

我一直想做一个像劳伦斯·布洛克一样的作家,一个像他那样的都市漫游者,挣钱多少都无所谓,只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活着。

灯影书香

以书之名

□梁艳

崔莹博士的新书《访书记》实在是一本有趣的书。这本书涉及汉学、文学、社会学、世界史、非虚构写作五个领域。书名叫做《访书记》,这些被访的“书”都有一些特点。这些书可能大名鼎鼎,在其研究领域享有盛名。比如《哈佛中国史》《剑桥中国史》《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这些书在西方汉学研究领域极具影响力。这些被“访”的书有些荣获了国际性大奖。比如英国女作家希拉里·曼特尔的《狼厅》和《提堂》分别获得2009年布克奖和2012年布克奖,美国黑人作家保罗·比第的《背叛》获得2016年布克奖,美国作家罗伯特·奥伦·巴特勒的《奇山飘香》获得了普利策小说奖。



崔莹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这些被“访”的书在写作题材、写作风格方面都有特别之处,让读者能够看到世界上诸多新鲜的领域和以前可能被忽视的角落。《Small fry》的作者是苹果公司前总裁乔布斯的女儿丽莎·布伦南·乔布斯,她在这本书中记述了自己成长的经历,但很多读者把这本书看成了乔布斯的传记,里面有很多乔布斯鲜为人知的故事。《美丽的标价:模特行业的规则》一书,作者原本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美女模特,但她

说是访“书”记,真正访问的还是写这些书的作者。这也恰恰是崔莹博士这本《访书记》的精到之处。看了一本好书,就想见见这个幕后写书的人,这在今天粉丝经济年代我们都能理解读者的这种心理需求。崔莹博士的这本书恰恰满足了读者的这种心理,她让我们不但知道这些书很有趣,写这些书的作者更是有趣。崔莹博士一共采访了51位作者,历经六年最终完成了此书。在她的采访中我们可以了解

很多作者背后的故事,以及他们创作的过程和性格特点及其人格魅力。

崔莹博士的《访书记》之所以有趣,还在于她高超的采访技巧和敏锐的洞察力。崔莹本是记者出身,又在爱丁堡大学拿到了社会政策博士学位。多年记者的实践经验再加上作为学者的独立思考能力,让她在面对诸多学界权威和社会名流时能够做到不卑不亢、平等发问,对待某些敏感问题能够步步追问,让采访有深度,让读者直呼过瘾。这可以作为新闻专业学生学习的模版。比如在采访白馥兰时,崔莹直接发问:“难道李约瑟难题是个伪命题?”白馥兰回答“是的”,并给出自己的理由。这是学者之间的对话,让读者看到学者独特的观点和态度的严谨。再比如采访日裔美籍学者入江昭,崔莹问道:“今年5月,你联合186名欧美历史学家发表联名信,呼吁安倍政府正视日本战时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问题,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入江昭回答:“历史就是对过去的记录。过去无法改变,我们应该分享各自对过去的认识。”这些精彩的提问和对答在此书中比比皆是。《访书记》一共采访了51个人,每个人崔莹大概会提问15个问题,算下来就是700多个问题。这700多个问题让我们认识了诸多有趣的学者和作家,让我们见证了有趣的灵魂。崔莹曾说“我要走一百个国家,采访一百个有趣的人。”崔莹博士的目标可能很快就要实现了,期待她有更多精彩的作品。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